

塑造具有浪漫情怀的洞庭湖渔民形象

——长篇小说《春柳湖》创作谈 □杨远新

创作一部反映中国淡水渔业百年变迁的史诗小说,是我几十年来追求的目标。越是对其深入研究,越发觉得,中国淡水渔业的生存发展之路,与中国农业的生存发展之路既同又不同,渔民与农民既似又不似。农民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渔民则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甚至被忽略、被遗忘。而从对社会发展、对历史进步、对人类生活所作的贡献而言,渔民的地位又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经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很快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而渔民则一直处于一家人、一条船,水上漂流、四海为家,岸上无居所、生产无田地、子弟无学上、医疗无保障、血吸虫病危害一代又一代的落后状态。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种现状,1966年2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改造连家渔船,实行陆上定居的伟大号召,深得广大淡水渔民的响应。位于西洞庭湖畔的春柳湖渔村,早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就已经在新任党支部书记黄春江的带领下,开始了探索和试验,而且数次向省市县三级党委直至党中央写信反映渔民的迫切要求。党中央的决策完全顺民心、得民意。春柳湖渔民抓住这一机遇,开发利用湖中的鲤鱼滩,重获新生,建起了社会主义新渔村。过去,“有女莫放渔民家”,如今,“有女争放渔民家”。春柳湖渔村成为了全国样板渔村。240万字的长篇小说《春柳湖》(全四部),全景式地反映了这一特定生活。

我出生在西洞庭湖畔的一户亦渔亦农家庭,工作后又在全国样板渔村蹲点十年,亲历亲见了渔民改造连家渔船、实现陆上定居、过上幸福生活的巨变过程,深切感受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渔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新渔村。

为了表现好这一严肃题材,我和杨一萌、陈双娥作了艰苦而又大胆的探索。首先抓住渔民的特点,进行重点突破。我们发现渔民身上最显著的特质是心怀宽广、浪漫大气,他们之所以浪漫,根本在于他们从不把天灾人祸、贫穷落后放在眼里。春柳湖的渔民,尤其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12个孤儿,尽管背负寡妇村、绝代堤的阴影,但依然乐观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力图改变现实。新中国的成立,让他们翻身做了主人,看到了美好生活的希望。孤儿出身的党支部书记黄春江决心改变渔民



千百年来四海漂泊、居无定所的现状,凭双手改变荒滩废水,建设美好幸福家园。

《春柳湖》的创作,前后跨越50年,支撑我们坚持到底的,是出于对渔民的真爱。如果说一部作品就是一条大江,那江里滚滚奔腾的,就是作者的情感,或者说,是作者的情感催生了江里的波涛。爱是情感的基础。没有爱,情从何来?爱得越真挚,情感越热烈;爱得越深沉,情感越长久。一场天长地久的

爱,这是写作长篇小说的基础。让情感在字里行间流淌,这是作者写作长篇小说必须具备的真功。唯有登峰造极的爱,方称之为浪漫。

浪漫孵化理想,浪漫催生目标,浪漫凝聚情感和力量。不具有浪漫情怀的人,干不成大事,成就不了伟业。想想那些开天辟地的巨人,他们在建党之初什么都没有,一穷二白,就连开会的场地都要租借。但他们最不缺的就是浪漫情怀。他们心中已经装有了中华民族百年发展的宏伟蓝图。黄春江引领建设的虽然只是洞庭湖西隅的一个小小渔村,但所显示出的英雄气概和浪漫情怀,与那些巨人是完全一致的。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浪漫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大字不识的渔佬儿,岂知浪漫为何物?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天作盖、地作被、五湖闯荡、四海为家的生存方式,正好养育了他们的浪漫情怀。

凡浪漫的,也是痛苦的,当然最终都是光明的、美好的、幸福的。黄春江带头进行连家渔船社会主义改造,让渔民上岸定居,历经磨难、峰回路转,最终建成了美丽新渔村,特别是建成了现代化渔业集团。一开始,对于黄春江绘制的社会主义新渔村建设规划图,根本没人相信,觉得是天方夜谭,是他的一厢情愿。想象是美好的、浪漫的,但是不可能实现,甚至被持旧观念、旧思想的人讽刺是白日做梦。他勇敢地反驳:当年一群年轻人创建共产党,为的是夺取天下、改变天下,不也被人嘲讽为白日做梦吗?可结果如何?当蓝图变为现实时,持旧观念、旧思想的人仍然不肯认输,还想走回头路。黄春江对他们的态度是挽救、教育、给出路。这越发体现了他宽以待人的浪漫情怀。

黄春江的爱情,也带有浓郁的浪漫色彩。一个穷得浑身上下只剩腰里一根草绳的孤儿,竟然与美貌如荷花的“渔霸”渔主的外甥女相恋,与此同时,又被人见人爱的梅秋华所爱。三人之间的爱情曲折而神奇,深深烙上时代和社会的印痕。一场爱情马拉松,历经大半个世纪,两个女人对他的爱从未因阴晴雨雪而改变。他深陷其中,而能以大局为重。这种三人之间的恋情,最终结局出人意料,充满诗意与浪漫。

黄春江身上的浪漫情怀,体现在各个方面,他亲手策划导

演了匡世宏和朱秋萍的婚姻,浪漫中包含苦涩,甚至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黄春江有着与时俱进的反思精神,既与自己的内心、又与外部传统的旧思想、旧观念抗争,最终获得思想的解放,使本来荒诞的婚姻,变成了幸福的大结局。

黄春江的浪漫无处不在。他的鸡公斗架只能赢不能输,赢了奖励猪油蛋炒饭,输了吊在树上一顿抽打。他送渔民远征洞庭湖时说的一段话,又可品出另一番滋味。他并不是只要成绩而不顾其他,而是始终把生命放在第一位。他抓工作总是做一、看二、想三,从他一只甲鱼做出的大文章,就足以看出他的超前思维和眼光。他能够把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水产专家刘筠请进春柳湖渔村,又能够把刘筠的得意门生留在渔村安家落户,春柳湖因此迎来了跨越式的大发展。

小说开篇营造了强烈的悬疑氛围。一个看似偶然而又必然的原因下,年过半百的“我”被委派到西洞庭湖畔的龙寿县出任副县长兼县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上任伊始,就遇上了一起蹊跷的人命案。全国淡水渔业战线改造连家渔船、实现陆上定居的样板春柳湖渔村党总支书记黄春江,亦是“我”的忘年交,去县公安局看望新任的公安局局长,在返回渔村、经过两水一堤时溺水身亡。是意外?是谋杀?公安局局长挑选“裁缝神探”“柔情神探”“洞庭蛟龙”组成专案班子,深入春柳湖渔村展开侦查。调查走访,询问交锋,推理分析,整个侦探过程,全景式地回顾了黄春江坚持连家渔船改造、实现陆上定居,矢志不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传奇人生之旅。

表现手法与内容的统一至关重要。《春柳湖》融悬疑、推理、描摹、抒情、辨析等多种艺术元素于一体,熔中国传统小说特质与欧美小说技法为一炉,既有细腻入微的心理刻画,又有浓墨重彩的场景描写,既符合浪漫主义,又不失现实主义,热烈讲述中国淡水渔民的故事,倾情塑造中国淡水渔民的形象,大力弘扬中国淡水渔民的精神,精心传承中国淡水渔民的情结,真实、深刻、好看、耐读。

一场关于商标的“战争”

——长篇报告文学《二十年之诉》创作谈 □杨黎光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有点拗口,叫“伟哥”不是“伟哥”。“伟哥”是一种治疗男性功能障碍的药,这是人们对这种药的称呼,怎么会“伟哥”不是“伟哥”呢?疑问即是故事,故事吸引了我。

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我一直喜欢尝试不同的题材和体裁,用不同的手法去写不同的故事。早期写小说也写影视剧本,后来主要写报告文学。在我的报告文学创作中,题材一直在变化,最初写社会变革中被欲望煎熬的人物居多,后来写社会重大事件,如1998年的大洪水、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2008年以后我差不多用了十年时间,写了四部关于对近代中国现代之路的反思系列,听到这个信息时,正好是最后一部作品《家园》完成。于是我很想挑战一下这个从未涉猎过,却又与人息息相关的药品市场领域发生的故事。

开始只是被好奇心所驱使,之后渐渐被带到一个未知的世界。两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大量资料的收集归纳、咨询专家学者、采访部分当事人、旁听法院开庭,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充满“硝烟的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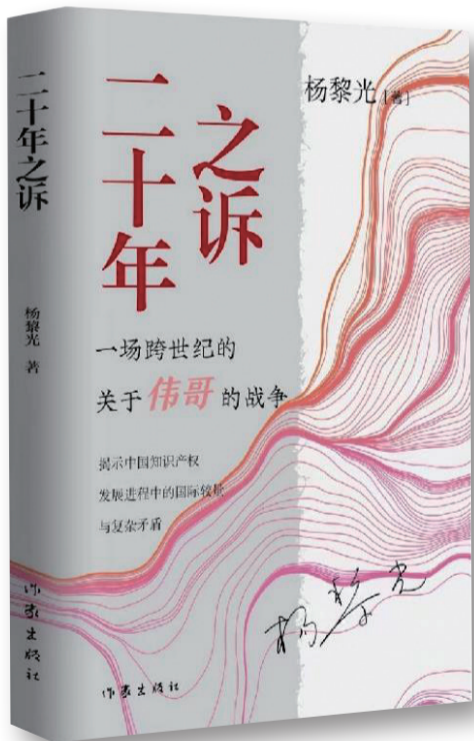
探究不同的领域

每次写作不同的题材、进入新的领域,对于作家来说都是一次挑战。这次我进入的是新药研发领域,首先要弄明白,“伟哥”是怎么来的?通过资料研究,我发现被称为20世纪“神药”的“伟哥”,其原本是美国辉瑞公司研发多年失败的一款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西药。可在它下马的时候,发现它的副作用对男性功能障碍有奇效,转而又继续研发。它在医学上的名字叫“枸橼酸西地那非”,其出现曾名噪一时,其中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因为中文媒体在海量报道中称其为“伟哥”,因此人们以为“伟哥”就是这款新药的名字。这款新药进入中国注册商标时,却发现广州威尔曼药业公司已经注册了“伟哥”商标。

难道这是一起恶意向注册商标的事件?结果不然,我在采访调查中发现,广州威尔曼药业公司是一个研发、制药、销售及国际贸易兼备的产、学、研一体化的联合企业,也一直在专注传统性医学资源的开发利用,致力于国产药品的研制。他们经过多年努力,也自主研发了一款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新药“甲磺酸酚妥拉明快速分散片/胶囊”。

新药研制出来以后要注册商标,公司于1998年5月20日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为稳妥起见,公司一共提出了“伟哥、伟姐、伟男、伟女、大哥大”等十多个类似语义的商标,结果其他商标被国家商标局驳回,而“伟哥”则幸运地被正式受理,因此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伟哥”商标的注册者。辉瑞公司的新药,在中国内地注册时取名为“万艾可”,但由于“伟哥”的知晓度太高,辉瑞公司发现它有巨大的市场价值,因此围绕“伟哥”商标的拥有权,对广州威尔曼药业公司发起了诉讼。

这场官司从1998年就开始了,一直打到最



高法院,整整打了11年。最后,最高法院驳回了辉瑞公司的诉求,维持“伟哥”商标归属于广州威尔曼药业公司的最后判决。可胜诉者却因官司拖了十多年而不能合法使用“伟哥”商标,成了实际上的利益受损者。接着,富有戏剧性的是原被告双方变换了角色,“伟哥”商标的拥有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称辉瑞公司等侵权,也发起了诉讼。这就让这起因“伟哥”商标权的归属和保护商标使用权而起、最终演变成维护知识产权的官司,前后拉锯般打了20多年,所以称为“二十年之诉”。

作家的思考与忧虑

多年来,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对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直是指责和攻击的,可我在采访和调查中,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现实,因此更增加了我写作的意义。

商标,就是中国人相对熟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国的《商标法》早在1982年就已制定,并于1983年正式实施,1993年、2001年又经历了两次修订。

实际上,中国是比较早就重视商标保护的国家之一。近现代以来中国人一直非常重视打造“金字招牌”,“老字号”的传统源远流长。据粗略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约有“老字号”1万多家,至今仍正在正常经营的仍有近千家,这些“老字号”成了中国近现代商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早在1900年签订《辛丑条约》时,美国、英国、日本就逼迫清政府签下了关于包括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条约。

在知识产权谱系中,商标是重要一环。所谓品牌,其核心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商标。被赋予了无形资产的商标,与专利互为表里,共同撑

起某个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价值。一个驰名商标可能价值连城,而驰名商标都几乎要经过长时间的培育。可“伟哥”这个中文商标是一个异数,它几乎是一夜成名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迅速价值连城。更为“神奇”的是,它竟然是在其所属商品还没出街前,就已经大红大紫了,堪称商标史上的一段传奇。

正因如此,美国辉瑞公司才不惜时间和金钱的成本,打了十余年的官司。而广州威尔曼药业公司后来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为自己合法拥有的“伟哥”商标维权,可见商标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重要性。

在解开了我的“‘伟哥’不是‘伟哥’”之疑问以及“伟哥”商标保护官司的由来以后,事实又引出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即中国性保健品市场曾经的触目惊心。

直面社会热点问题

这样,我就从关注“伟哥”商标保护官司开始,进而延伸至中国保健品市场尤其是性保健品市场曾经上演的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戏剧中。我带着好奇的心理,在调查和采访中发现了我们一个我们不熟悉却“热闹”异常的领域。我不仅了解了中国保健品市场从乱到治的过程,了解了所谓“壮阳”药品市场的混乱,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中美关于知识产权的同异和斗争,以及美国药企如何滥用法律手段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中国药企最初没有良策应对,最后也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作家应该勇于直面社会热点问题,即使有些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但为了防止危害民众,也应该予以高度关注,这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所以作品《二十年之诉》的写作主旨,并不仅仅局限于“伟哥”商标归属的问题,而是整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中美两国药企博弈所反映出的社会意义。

对于这桩官司,我并没有倾向性的观点,因为法律已经对“伟哥”商标的归属有了明确的判定,它属于中国药企广州威尔曼药业公司。我所关注的重点,一是要通过这样一桩官司,反映出它背后的社会问题,二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这些都是社会热点问题。于是这本书的写作有两个特点,一是事件的悬疑一个被解开,另一个又出现,二是作家本身也在不断地深入、不断地思考、不断改变写作的主旨。

这本书写完了,悬疑却没有完。我在大量的资料收集,发现了一个跟“伟哥”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却奇怪地拥有一个“中国伟哥之父”的头衔。他利用“伟哥”的高知名度,在股票市场上一通神操作,捞到了大笔不义之财,待我再次深入了解时,发现他已经是名海外通缉犯。经过不断地深入了解,我又发掘出另一个“传奇”故事,因此,在写完这部《二十年之诉》以后,我又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叫《变脸人生》。

因此,这是一次特别的创作之旅,一个疑问将我引进,前后陷进去四年,创作了两本书。

在《小说的终结》中,曼德尔施塔姆指出,小说的内容是人的传记,而现代小说已经被剥夺了情节和人物据时间意识而采取行动的能力,同时也被剥夺了心理学的内容。

本雅明认为,精神实体与语言实体乃是同一的,所有语言都传达它自身,这其中并没有其他意为“表达”的中介存在。弥赛亚是在当下之中召唤历史的一种语言学现象,并且历史存在的条件是它业已被救赎了。

以这两种观念为基础,我们可以认为,《欢迎来到新世界》是一本文学性极强的叙事作品,它是一本无法用题材和内容来简单标签化的书。它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小说是一门叙述的艺术的观点,并且它极其亲近戏剧、故事、书信等其他体裁的特点,拥有边界线位置特有的异域风格。

站在人生的向上,我们邂逅了温情柔软的王俊生,奇情诡魅的纯、也纯,还有阴影里身份莫测的“莎士比亚”。这样的捕捉是对人生经验的提炼与升华,是多重世界观、宇宙观的碰撞。

王米是一个自由的创作者,这在流浪汉小说《长歌始末》中可见一斑,从中不仅可以听到20世纪文学传统的余音,如对田园诗似的田野生活的向往、流浪客生活对都市文明的破坏,还有对淘宝、自媒体、民宿、虚拟现实等新事物的预言。王米大一时在德勒兹的废墟美学影响下拍摄了短片《诗人已死》,大量使用了荒原、遗址、孤独凋零的人等意象,算是同一主题的重复。正如印象主义是对长久因袭的印象的拒绝,是一种对彼时彼刻的纯粹客观描绘,现代主义对准了赤裸裸的人的原始本性,现实主义也包含了各种反对现实的因子,这本书的叙述更偏向于传奇和自然主义风格,却强调了人的意志力,充满了人的不甘和奋斗,并且把女性命运当作一种独特的客观存在来讲述,超越了作为流派的自然主义。小说集将浪漫派、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等风格一一回顾,亦是证明了每一个个体的成长都是对人类历史的一次钩沉。比起其他同时代的小说集,《新世界》也许具有更强的故事性,但它并不仅仅是讲故事或者写意地描绘人性,它有一种朝向现实世界的坚不可摧的意志,代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绝对意志。王俊生、纯、白茉莉、李雪晏等人物都有很强的精神性,这种精神性一次次要求读者去反诸自身,去体会精神的苦旅。

本书最值得肯定的,是对叙事性的总结性提炼和歌颂,对运动、变化的强调与推崇,让它成为短篇小说里节奏与主题的佼佼者。专业为电影创作的王米使用了大量的辩证法(或叫蒙太奇)去加剧故事效果,叙事点线面结合,段落之间的省略加剧了起伏感,人物之间个性彼此冲撞,叙事调子的浓墨重彩和语言精简之间并不矛盾,甚至很多地方让人想起江湖川乱步和爱伦坡。如蒙太奇,王米说起过,王俊生的叙事起因是有天她在家门口发现了刚买的牙膏的包装盒,但其牙膏是她早晨起来刚订外卖买的,和许多东西一起在袋子里,并没有拆开,她更不会把牙膏盒扔门口。两个画面一起出现在脑中,她得出了有人入室过的结论,她甚至能知道是某个刚在院里擦肩而过的人干的,那个垂头丧气的大头胖男人,她说。

在叙事手法上,与王米相似的是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女性情怪小说家安吉拉·卡特和《好人难寻》的作者奥康纳。他的剧作总是强调人物欲望和动作,而小说则强调命运无常与环境的反常。这种非常规的小说,剧情和语言、人物与作者无法分割看待,它属于永久的过去,属于书写时的作者,更属于读者翻开书阅读的那一刻,这时小型戏剧将再次搬演。

《不是每个男孩都叫王俊生》的故事是喜剧,讲述了善良的乡巴佬无论何时都可以从容地谈情说爱的故事。喜剧的基本技巧是重复,王俊生就是一个在故事里没有任何变化的、好像仅仅是重复的人。弗莱在《批评的解剖》里把喜剧定义为从人物从一个群体(乡绅)到一个群体(罪犯)的运动,其行动无非是因为愿望受到阻碍,而把悲剧定义为“酒神节”型的故事,描写的是一个无法为环境所接受的人,一个替罪羊。《欢迎来到新世界》和《少女尹小美》(剧本)都是悲剧,悲剧一般有很强的讽刺感,但后者的讽刺性已经被作者降到最小,人们无法责怪这个一根筋的、单线的、有能量的女孩。《桃花海》是传奇故事类型,弗莱认为,“传奇的主要成分是冒险,它是一种永无穷尽的形式,其中心人物从不发育也不衰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险遇,直到作者本人耗尽最后一点精力”,它唤起读者的怜悯与恐惧。这些常规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里完全见不到的人物和故事,在王米的笔下慢慢轮廓清晰地浮现,随音乐般的语言涌动,又带着孩童般的天真无辜。

小说想要纯粹虚构不太可能,这本书中有大量王米自己的影子,是基于可能性版图的探索,即便有些人觉得不符合事实,它也一定符合另一个别处的理论框架。

当下的纷争来自各种意识形态的搏斗,理论一旦式微,假道学就粉墨登场。王米的小说是静观的文字,也是艺术青年努力搏斗、拼死挣扎的文字,是值得珍惜和阅读的。

在自身之中,并朝向过去

——评王米《欢迎来到新世界》

□王佐拉

